

# 1870 年代初期的京都博覽會與古寺 之參與：古寺及其場域內文物於近 現代的意義轉化

巫佩蓉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法鼓佛學學報第 36 期 頁 123-163 (民國 114 年) · 新北市：法鼓文理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36, pp. 123-163 (2025)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DOI: 10.53106/199680002025060036002

ISSN: 1996-8000

## 摘要

早在 1871 年，即日本明治 4 年，京都地方人士便於西本願寺舉辦了明治時代的首次博覽會。會後，常設組織「京都博覽會社」成立，具半官半民性質，並於 1872 年舉辦第一回正式會事，會場為西本願寺、知恩院、建仁寺。雖然京都博覽會標舉「開拓新知，輔國富強」的目的，並未特別提出推動佛教文化之意圖，然而，因實質上有諸多古寺提出展覽品，並於初期以寺域作為會場，使得此會成為佛寺文物被新觀眾群觀覽的場域。在觀覽脈絡轉變之情境下，即使佛寺文物仍存於原來的空間，文化意義卻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京都佛寺與所屬文物，原本的意義範疇存於信徒的宗教目的與本地文化圈的賞鑑傳統中，然因時代巨變，無論是新觀眾的加入，或是舊觀眾參與角度的改變，物件在知識體系中的定位迥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博覽會主辦單位有意吸引外國觀者，並擬定多種具體措施。觀察這些來自不同文化圈新觀眾的參與過程，更可見到寺院古物於新時代中意義轉變的軌跡。

本研究不以京都博覽會正式標舉之目標為限，而是仔細考察實際舉辦的細節。這些實質狀況，有助於辨析此類非以推動「美術」或「佛教文化」為主旨的新式活動，於定型化的文物編纂活動出現之前，如何促進古代文物被納入現代知識系統。

## 目次

---

- 一、前言
  - 二、由時代背景探索京都地區古寺參與博覽會的積極理由
  - 三、京都博覽會與外國觀者
  - 四、1871 年與 1872 年京都博覽會場的具體範圍及構內文物
  - 五、結語
- 

## 關鍵詞

京都博覽會、西本願寺、建仁寺、知恩院、東西文化交流

## 一、前言

古代寺院文物於東亞歷史中的傳統定位，隨著 19 世紀以來東西文化交流的浪潮，於近現代社會中如何轉折變化，是筆者關心的議題。本研究以 1871 年、1872 年兩回京都博覽會的資料為基礎，聚焦於京都之古寺參與明治（1868-1912）初期新式展示的狀況。除了整理古寺具體參與的面向之外，本文也將探索，因參觀博覽會而到京都遊歷的西方人士，可能接觸哪些寺院文化。外國觀者雖然人數占比並不高，但資料顯示主辦單位有頗多針對外國人士的安排，可見是博覽會主要訴求的對象之一。透過探索與外國觀者有關的安排，更能顯示包含古寺在內的博覽會主辦方，在新時代中的積極應對。

雖然京都是著名古都，但舉辦新式博覽會的時間卻相當早。一般熟知的日本內國博覽會，1877 年 8 月於東京上野公園首度舉行，但京都最早的博覽會於 1871 年秋季便已舉辦，比內國博覽會的開辦早了六年。隨後，地方人士成立「京都博覽會社」的組織，次年，即 1872 年春季，開始第一回正式會事。除了舉辦時間早於全國性的博覽會之外，早期京都博覽會還有一特殊之處，即會場是著名的寺院。1871 年會場為西本願寺，1872 年則有三個會場，分別是西本願

---

\* 收稿日期：2025.2.26；通過審核日期：2025.6.16。

本研究為「漢傳佛教四百年」整合計畫子計畫之一，於 2022 年至 2023 年獲聖嚴漢傳佛教研究中心補助，特此致謝。論文部分內容曾於 2023 年「第九屆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研討會」發表，謝謝與會學者指教，尤其是廖肇亨老師。研討會稿經大幅改寫後投稿，復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評論修改，方成此文，衷心感謝過程中的批評與建議。並謝謝助理劉思涵、管若晴、郭宜樺的協助。

寺、知恩院、建仁寺。<sup>1</sup>表面上看來，京都博覽會並未特別標舉推動佛教文化之意圖，然而實質上，由於最初兩次會事皆以著名寺院作為會場，且有多所寺院提供展覽品，使得此會成為佛寺文物得以被新時代觀眾觀覽的場域。

博覽會本是一種新式，或者說西方式的活動，相關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如 1986 年吉田光邦編纂的《万国博覽會の研究》一書，便收錄了多篇日本參與國外博覽會，與舉辦國內博覽會之研究。進入 21 世紀，2005 年，國雄行，《博覽會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覽會政策》一書，更加廣泛地探索日本國內博覽會。然而，學界對於明治時代博覽會的研究，多以會事如何推廣西方新知，或促進工商發展為主，如丸山宏對明治初期京都博覽會的探討即為一例（1986, 221-248）。諸研究中，僅有少數學者觸及博覽會中的古文物。並木誠士，〈京都の初期博覽會における「古美術」〉一文最具參考價值，然仍未完全解明當時的狀況（2008, 318-337）。近年學界對於博覽會持續關心，2022 年京都龍谷博物館舉辦了以「博覽」為題的特展，並由和田秀壽編纂圖錄，提供了西本願寺參與博覽會的諸多細節，足以啟發未來的研究。<sup>2</sup>

本研究擬以三個主題，呈現與先前研究者不同的關懷。一：由時代背景推敲京都地區古寺參與博覽會的積極理由。二：探討京都博覽會針對來自異文化圈的參觀者，也就是西方人士，有哪些特殊安排？並且，在這些安排下，西方人士

---

<sup>1</sup> 與京都博覽會有關的資料，主要參照《京都博覽會沿革誌》。

<sup>2</sup> 2022 年 9 月 17 日至 11 月 23 日，京都龍谷博物館舉辦了以「博覽」為題的特展，由網站資訊可知包括了初期的京都博覽會資料。因疫情之故，未能前往觀展，但取得圖錄（龍谷ミュージアム）。

可能接觸到哪些與古寺有關的文化？三：探討京都古寺參與博覽會的實質狀況，特別是釐清寺域作為博覽會場的明確範圍。釐清展場範圍，不但使我們具體了解展覽規模，也可推估，在寺域中移動的參觀者，因空間特色而認知或感受到哪些古代文化。本研究的目的，並非完整地討論博覽會本身的意義，亦非探索古代文物在現代專業研究之後的明確學術定位，而是意圖分析時代巨變之初，也就是明治時代最初期，古寺如何由原本的在地定位跨出，迎向來自不同文化脈絡的參與者。透過參與新式展覽的方式，京都寺院之佛教文物融入近現代社會的活動中，由原屬宗教或本地文化脈絡的物件，逐漸轉化意義範疇，被認定為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限於研究時間與篇幅，有關古寺於初期京都博覽會中提出展覽品的內容問題，將於未來另文探討。

## 二、由時代背景探索京都地區古寺參與博覽會的積極理由

本節將介紹 1871 年與 1872 年京都博覽會整體狀況。呈現客觀資料之後，筆者試圖由當時的時代發展，探索當地古寺參與新式博覽會的可能原因。京都舉辦博覽會之時間，遠早於 1877 年於東京舉行的第一次內國博覽會，令人感到相當好奇。一般說來，即使有官方的倡導，新觀念也未必在短期內就讓整個社會接受。為何京都這樣以悠久文化著稱的古都，卻相當積極地於明治初期舉辦博覽會？不僅如此，當地許多具有歷史傳統的古寺，也有頗高的參與度。這是當地寺院不得不屈從於官方強制的要求，或有其他更複雜的背景因素？在探索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說明京都博覽會的初期狀況。

京都最初的博覽會，於明治 4 年（1871）舊曆 10 月，

在西本願寺大書院舉行，會期一個月左右（舊曆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1 日，即西曆 1871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2 日），有 11,221 人參觀（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2）。雖然佛教寺院於近代之前的社會中本就有公開的性質，然於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即有萬人以上的參觀人次，仍顯出與古代不同的狀況。初次博覽會後不久，當年年底，相關人士組成了「京都博覽會社」（之後改稱「京都博覽協會」），是一半官半民的組織。京都府首任知事長谷信篤（1818-1902）予以支持，並有京都府吏員參與，但會主為民間人士。<sup>3</sup>會主三人皆為豪商：三井八郎右衛門（1808-1885）、小野善助（1831-1887）、熊谷久右衛門（1817-1875）。<sup>4</sup>會社成立後，官民積極籌辦，第一回正式的京都博覽會，於明治 5 年 3 月 10 日（西曆 1872 年 4 月 17 日）起，在西本願寺、建仁寺、知恩院三個會場舉行，會期原訂五十日，但後來延長為八十日。<sup>5</sup>第二回至第九回的會場，則在大宮御所和仙洞御所，即今日京都御苑之內。1881 年之後，在御苑東南邊建設了專用會場，持續舉行（丸山宏 1986，221-248）。

京都博覽會舉辦的目的，如以會社成立後的正式公告來看，在於「開拓新知，輔國富強」，因此「遍集天產奇物、陳列人造妙器」（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16-17）。表面看來，此會與其他博覽會的公開聲明並無明顯差別。不過，若檢視實際展出的品項，除了天然物產、新式機械、當代

---

<sup>3</sup> 會主及其他組成人員，見：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3-6。

<sup>4</sup> 和田秀壽 11-42，提及會主為 13、20。

<sup>5</sup> 當時日本尚使用舊曆，資料還特別標明，明治 5 年 3 月 10 日開場，為西曆 1872 年 4 月 17 日，見：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13。延長為八十日之事，記於同書 37。

工藝製品之外，還包括數量頗多的古代文物（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 64-125）。並木誠士指出，1871年秋季的會事，展覽的古代文物中似乎難以找出今日所知的名品；但1872年博覽會社成立後的第一次正式會事，便已得到著名寺院的配合，展出之部分品項，由寺院提供，其中不乏今日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重要文化財」等級的古代文物（並木誠士 2008，318-337）。並木先生之文頗具前瞻性，但討論尚未詳盡。筆者進一步調查，發現提供京都第一回博覽會展品的單位中，寺院多達九十七所，其中有八十所位於京都，十一所大阪，三所奈良，三所滋賀。對比其他的「出品人」，包括：鐵道寮、造幣寮、大阪府、勸業課、舍密（化學）課、四個神社（京都二、大阪一、山梨一）、一組內（京都）、九個滋賀的村、十二個京都的町、五十七個商社（京都五十六、大阪一）、八百三十二個人（京都七百七十、大阪五十三、東京一、滋賀六、長崎一）<sup>6</sup>、六個外國人（英國、法國、普魯士）。<sup>7</sup>此資料並無列出個別單位的出品詳目，但僅由數字，便可知寺院的參與相當踴躍。由其他資料，得知所有展覽品項多達千項以上，目前尚無法完整釐清寺院提出展品的詳細狀況，擬於未來繼續研究。<sup>8</sup>然而，除了展覽品目，展覽會場地本身，也值得關注與探討。由於展覽會場本身就是寺院，且寺域中不乏具有歷史淵源的

---

<sup>6</sup> 加總數字前後有異（八百三十二個人／八百三十一個人），此處保留原書登載之數。

<sup>7</sup> 此資料並無詳目，僅有數字。見：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28。

<sup>8</sup> 現已知的第一回京都博覽會展出目錄至少有兩種，由東京文化財研究所整理印出。目錄 A，列有 2637 項，見：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 64-108；目錄 B，列有 1378 項，見同書 109-125。完整的研究將有待未來進行。

古代建築物，如此一來，包括西方人在內的一般觀者，透過京都博覽會，不僅得以見到展出的日本古物，更可見到作為展場的古代寺院內部，這似乎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新式博覽會少有的現象。有關古寺提供展覽場域的具體範圍，將於後文探討，此處先聚焦於為何古寺有意願參與博覽會。

已有多位學者研究，日本由江戶時代轉為明治時代，官方對於古代文物的調查與定位，具有主導權。誠然，官方的企圖與作為，對於現代意義下的「美術史」論述方向，影響深遠。<sup>9</sup>不過，除了探討日本官方的立場之外，我們也需要考慮社會上其他單位的順勢配合或主動支持，方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無論京都古寺是迫於時勢，或者真正掌握時代脈動，早在 1871、1872 年便積極參與新式博覽會，應有特殊的理由。

筆者認為，古都地方上人士與古寺人員，之所以願意投入博覽會這類新式活動，與時代變遷而面臨的巨大困局有關。以京都市而言，當時面臨的空前危機，是 1869 年（明治 2 年）天皇移居東京。雖然日本政府並未明確宣布遷都東京，但實質上有大量的重要人士隨天皇遷移，留在京都的地方人士深感千年都城的地位不保。<sup>10</sup>遷都，不僅是制度上的問題，更牽涉到人口外移、經濟命脈存續，以及城市文化的維繫。無論於精神層面，或是實務層面，如何確保京都過往的榮光，甚至能開創新局，是 1870 年代初市民強烈關心的

---

<sup>9</sup> 相關研究見以下書籍：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北澤憲昭等，《美術の日本近現代史：制度、言説、造型》；佐藤道信，《「日本美術」誕生：近代日本の「ことば」と戦略》、《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

<sup>10</sup> 參見：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明治二年の東京遷都》，特別是頁 167-168；脇田修、脇田晴子 286-295。

問題。研究者指出，明治初期的京都地方人士，相當積極地開創新的事業。而因應新局的重要舉措之一，也包括舉辦博覽會。<sup>11</sup>《京都博覽會沿革誌·緒言》中，指出維新之際「滿市菜色」且「人煙稀粗」，而博覽會除了「開發誘導天賦之知識，鼓舞作興可養之才藝」之外，並兼有「挽回救護都市衰頹」之任（金子錦二 4）。透過其他資料，更可輔證，〈緒言〉中指出京都面臨的衰頹危機，並非危言聳聽。1871 年 9 月有一奧地利退休外交官胡伯納（Joseph Alexander Hübner，又稱 M. Le Baron de Hübner，1811-1892）曾造訪京都。<sup>12</sup> 這位以環遊世界聞名的旅人於遊記中寫著，他留意到街市的冷清，並明確指出京都之蕭條與天皇移居東京後，大量人口隨之遷移有關。<sup>13</sup>

另一方面，以古寺來說，1868 年，明治政府頒布「神佛分離令」，強制神道與佛教寺院系統分開，劇烈地改變了佛寺於日本社會中的角色。<sup>14</sup> 京都市的整體發展與佛寺的困境原是兩件不同的事，但後續影響則有所交集。無論是諸多佛寺，或是京都城整體，面臨的困境不僅是既有榮光不再，更有迫切的經濟問題。「神佛分離令」，強制神道與佛教寺院系統分開。政府的命令有政治與經濟上的多重因素：除了強化皇室與神道的關聯性之外，亦因德川幕府素與佛教寺院

---

<sup>11</sup> 《京都博覽會沿革誌》提到創立博覽會與復興京都有關，見：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1-2。多篇論文，也都提到此點，見：丸山宏 1986，221-248，特別是 221-222。並木誠士 2008，318-337，特別是 322。

<sup>12</sup> 有關胡伯納的京都遊歷，請參考：巫佩蓉 2023，59-102。

<sup>13</sup> 本文參考英文版本：Hübner 347-367。遊記原為法文：*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

<sup>14</sup> 慶應 4 年 3 月 13 日（1868 年 4 月 5 日），太政官布告「神佛判然令」，又稱「神佛分離令」。

有密切關聯，且不少寺院擁有龐大的土地利益與免稅特權，甚至還有來自幕府的豐厚補助，這些都是新政府想要削弱佛寺的原因。「神佛分離令」強化天皇與神道的聯結，同時打擊了佛教寺院的聲望。在實質的經費層面上，1871年，政府取消了寺院土地免稅的特權，1874年更下達「寺祿全廢」的命令，廢除了官方撥給寺院的補助，使得佛寺面臨空前的困境（高田良信、堀田謹吾 139-175、288-289）。<sup>15</sup> 雖然明治政府的政策是針對全日本的佛寺，但以古寺聞名的京都想必受到特別大的衝擊。舉辦博覽會時，雖然尚未到「寺祿全廢」的階段，但寺院必然已面臨窘困。

值得注意的是，寺院經費的短缺，又與京都城市經濟問題交互影響。京都自古以來有許多精緻的工藝產業，包括木雕、金工、漆器、陶瓷、織品等。這些工藝產業的主要供給對象，除了皇室貴族等上層人士之外，也包括寺院本身，或是與寺院有關的人員。天皇移居東京，上層階層也隨之東移，佛寺又因政策之故面臨象徵地位與實質財力的衰落，連帶使大量精緻工藝產業衰退危機迫在眉睫。<sup>16</sup> 為使產業能蓬勃發展，既要找到新的購買群，也要強調原有傳統的榮耀特質，京都人積極地開展新的活動。

為京都尋求新契機的作為中，外國人士是重要的訴求對象，而於京都本地舉辦的博覽會中吸引外國觀者，即是實質作為之一。值得考慮的是，於京都舉辦大規模的新式活動，且於活動執行細節中顯見積極鼓勵外國人士的參與，是否與

---

<sup>15</sup> 由於境況窘迫，有些寺院亦有賣出所藏文物的狀況，在高田良信、堀田謹吾的《追跡！法隆寺の秘宝》書中亦有討論。

<sup>16</sup> 有關京都傳統工藝的轉型，請參考：並木誠士等，《京都伝統工芸の近代》，特別是頁4，指出遷都東京是京都近代須對應的重大問題。

明治政府的政策有關？在此須舉出兩個重要事件作為參照。一是著名的岩倉使節團，以岩倉具視（1825-1883）為首的明治政府高官，於明治 4 至 6 年訪察美國與歐洲各國。此團包含四十位以上的官員，加計留學生與隨從人員則有百餘位。明治 4 年 11 月 12 日（西曆 1871 年 12 月 23 日）出發，明治 6 年（1873）9 月 13 日（此年日本改用西曆）回到日本。使節團初以修訂與外國之條約為主要目標，然長達一年以上的歐美訪察過程，實際考察歐美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狀態，對於明治日本的發展有多方面的重大影響。<sup>17</sup>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明治 5 年（1872）東京之湯島聖堂舉辦了文部省博覽會。此博覽會一般被視為與日本政府準備 1873 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有關（國雄行 2010，52-73）。這兩件事，顯示了新政府的主要課題之一便是因應來自西方世界的衝擊，而中央高官確實在明治初期便以積極的行動應對。岩倉使節團有修訂條約的明確目標，除了談判本身，如何具體顯示日本的文化內涵與文明進步，並把這樣的進步形象展現在西方人士之前，也是核心的一環。積極地參與國外舉辦的博覽會，是明治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並被當前學者評為成功地於西方社會中塑造日本的國際形象。

上述事件已有諸多研究，無須於此細論，本文關注的是，參照明治 4 至 6 年的中央政府動態，如何定位京都當地博覽會的舉辦契機？要特別注意的是，首次京都博覽會於明治 4 年（1871）10 月 10 日開展，比岩倉使節團出發的日期還早，也比文部省於湯島聖堂舉辦的博覽會要早。換言之，京都博覽會之主事者，並非僅是亦步亦趨地跟隨中央政府的

---

<sup>17</sup> 有關岩倉使節團，請參考：田中彰，《明治維新と西洋文明：岩倉使節団は何を見たか》；有關行程與人員，見 205-213。

政策方向，而是共同體會時代的脈動，於相近的時間點，甚至是提早一步付諸實行。近年學者指出，20世紀後期有諸多重要研究，評述明治初期美術展覽史的發展，固然有重大貢獻，但也因這些研究過於集中討論東京一地之活動，而忽略了日本其他城市，特別是京都的先驅性與新創性（並木誠士 2019，iv-xv）。京都新式活動的舉辦，呼應了明治中央政府所追求的西方文明價值，也有於外國人面前呈現日本進步之意圖。然而，考慮城市遭逢的特殊境遇，即天皇東遷、因政策造成佛寺地位陡降等情境，能以另一種角度，解釋為何這座以古老傳統文化聞名的城市，在官民同心協力之下，於明治時代的最初幾年，便下定決心籌辦西式的博覽活動。而古都原有的在地文化內涵，又使此博覽活動於實際舉辦細節上具有獨特性，佛寺的積極參與便是特殊性之一。

無論是為了保有長年以來的歷史榮光，或是顧全實質的經濟利益，京都在地人士有迫切的需求，需要以積極的方式，發揚此地原有的傳統資產，特別是富有特色的工藝製造。在此情境下，可以想見，新式博覽會促進產業發展的目標，與展示寺院古代文物的作為，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有凸顯京都歷史文化特色的效果。外國人士是京都傳統工藝製品的潛在新買家，有直接的經濟效益。除了具體可見的經濟利益之外，更深遠的效益，在於外國人士對當地文化的肯定，可凝聚成京都的國際聲望。由京都博覽會的相關資料看來，舉辦方有許多特意為外國遊客設想的作法，可見執行者意識到外國人士於時代轉折之際，對京都未來發展之重要性。

### 三、京都博覽會與外國觀者

京都博覽會的舉辦，並非專為外國觀眾，但可注意的是，由《京都博覽會沿革誌》看來，博覽會籌辦時，為外

國人設想的作為相當仔細，可見吸引外國觀者是主要目標之一。討論之前，先看一下博覽會的參觀人數與身分。據統計，1872年3月10日至5月30日間，博覽會社成立後的第一回正式京都博覽會，參觀者包括日本人38,634人（含男女學生共7,531人）、外國人770人。國籍方面，目前僅知本願寺會場有統計部分來訪人士國籍，包括英（英國）125人，佛（法國）17人，米（美國）66人，獨（德國）13人，李（普魯士）10人，蘭（荷蘭）9人，伊（義大利）3人，瑞（瑞士）10人，支（中國）10人，印（印度）1人（京都博覽協會上卷，38）。目前並無資料可知這些外國人，是原本就居於日本，或者由海外而來。需要說明的是，就當時已居日本的外國人而言——無論是外國使節、受雇於政府相關機構的外國人士、商人等——並無於日本各地自由旅行的權利。適用於外國人的內地旅行辦法，於明治初期尚未開放，但政府卻於京都博覽會舉辦期間，實施特定的申請法規。從外國人的角度看，京都博覽會確實是申請旅行許可的大好機會（丸山宏 1985，89-112）。而由京都當地人角度看，京都博覽會是古董商、工藝品商人了解外國人品味的重要場合，對於城市的經濟發展甚有助益（山本真紗子 393-402）。

《京都博覽會沿革誌》目錄中，列出第一回博覽會舉辦籌辦之際，多項與外國人有關的條目，包括「外人入京許可」、「外務省勸誘各國來觀」、「外國人入京規則」、「外國人入京鑑札」、「保護外國人之警吏」、「外國人投宿手續」、「同（外國人）旅宿」、「同（外國人）料理獻立」、「外務省吏員派遣」、「通譯官交代派遣」等。<sup>18</sup> 細

---

<sup>18</sup> 京都博覽協會上卷，目錄3。（目錄與本文有不同頁碼）

讀這些條目的內容，可知有些是管制性的，也就是制定規則以管理外國參觀者；有些則具有服務性質，如提供旅宿、餐飲、翻譯人員等。

明治初期，延續江戶時期對外國人的管制策略，外國人僅能在有限的區域內活動。直到 1874 年，日本政府才放寬外國人在日本國內旅行的規定。但早於普遍的規章，政府在京都博覽會舉行期間，也就是 1872 年起，卻同意外國人以此為由，申請至京都旅行（工藤泰子 77-100）。無論是日本的外務省、外國公使館或領事館，皆配合此活動訂出規定辦法，以便外國旅客得以遵從。政府為了保護和協助外國人，也特別安排了警吏和譯官（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8-25、29-30）。這些法規資料中，並無闡明為何日本政府要於此時特許外國人士參訪京都。如前所述，中央政府於明治初期欲與西方世界的積極交往的企圖，或可解釋當時的趨勢。而京都博覽會社三位民間會主的政商背景，很可能促使京都博覽會得到較多的官方支持。三井八郎右衛門為三井財閥之首，素以支持明治新政府聞名；小野善助對於第一國立銀行的開設出力甚多；熊谷久右衛門也以「勤王」聞名，並對京都地區的新式教育頗具貢獻。<sup>19</sup>

除了法規面使得外國人得以探訪京都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京都的地方官吏及民間產業，顯然不只是消極地作行政方面的配合，而是趁勢推出各種積極吸引外國旅客的活動。官方協助規劃博覽會之外的京都市內及郊區旅遊，旅館業者也對住宿安排作了規劃，並為西方遊客準備特別的食材與酒類（京都ホテル 145-146）。餐飲的選擇上，主

---

<sup>19</sup> 並木誠士 2008，318-337，特別是 326-327。

辦方考慮十分周詳，針對外國人需求，三餐有西方式的餐點。如早餐便提供咖啡、砂糖、牛奶和麵包。一方面有符合外國人生活習慣的供給，一方面又提供具當地特色的餐飲。會期中另設有數處茶席，提供日式茶點。知恩寺三門附近的茶席尤為雅致，陳列「文具清玩、盆栽茶瓶、香几書秩」。<sup>20</sup> 此外，除了展覽會場，外國人也被允許於京都旅遊，範圍不僅在京都市內，甚至還包括郊區的琵琶湖（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12）。又，第一回展覽會後，為了持續吸引來訪的外國旅客，京都府顧問山本覺馬（1828-1892）主張要有英文導覽手冊，因此發行了《為外國訪者而作的京都與周邊名勝導覽》（*The Guide to the Celebrated Places in Kyoto & the Surrounding Places for the Foreign Visitors*）（Yamamoto）。<sup>21</sup> 這本導覽手冊，雖然在 1873 年才出版，第一回正式會事的參與者尚無法見到，但也可知博覽會進行過程中，主辦方持續關注外國觀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們可由外國媒體的報導，得知外國遊客對京都博覽會的關注。《倫敦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於 1872 年，刊出以〈日本展覽〉（“The Japanese Exhibition”）為題的報導，由旅居日本的插畫家威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1-1891）提供圖版及簡要文字報導（Wirgman 200-201）。文中，威格曼提到他參觀了位於知恩院的展場。進入展場之前，先看到細膩精美（exquisite）

---

<sup>20</sup> 當時西式的早餐、中餐、晚餐菜單可見：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21-24；日式茶飲見同書 31-32。

<sup>21</sup> 另請參見：丸山宏 1986，221-248，特別是 244。另有資料顯示，京都博覽會英文導覽書，曾經同志社大學創立人新島襄夫人八重子（即山本覺馬之妹）校訂，見：京都ホテル 146。

的庭院，還見到兩個坡道，一是供男性走的陡坡，另一則是供女性走的緩坡。他還提及入場卷印有英文字和日文字。威格曼並說明了自己所繪的圖（圖1），他所畫的是展覽武士盔甲的展場，畫中右前方正是德川家的盔甲。畫中前景有兩位穿著西式服裝的日本男士，是與展覽策畫有關的人員。畫中還可見很多女學生，她們是一起被安排來看展的。

威格曼的文字描述頗值得關注，他提到了對具有日本特色之古物（盔甲）的興趣，更透露出對於日本新舊變化的細膩觀察（穿西服的日本男士、女學生等）。新舊之變或為外國觀者的關注點之一，然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京都博覽會展覽品物中的新式物件，比如西方的機械，絕對不會是西方人士想參觀此博覽會的主要理由。在博覽會場及會外，可以見到的日本古物及本地手工製品，還有經特許後在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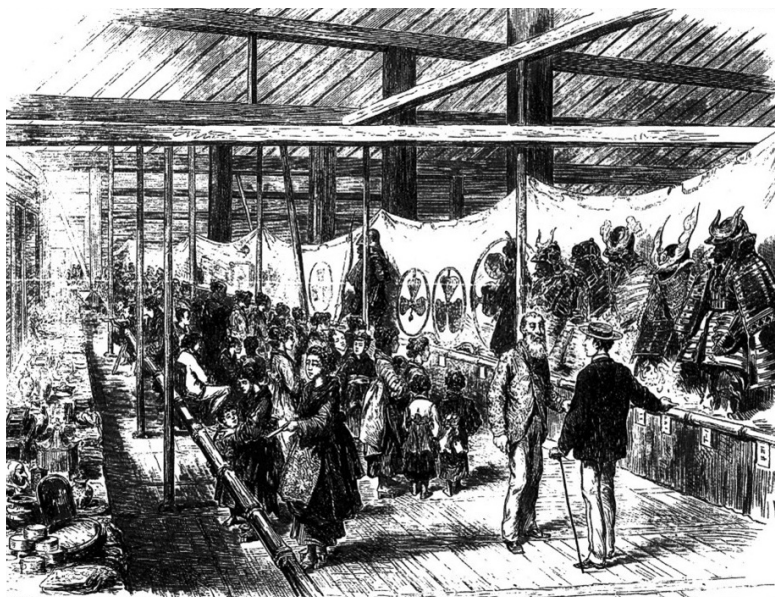


圖1：《倫敦畫報》刊載的京都博覽會會場（Wirgman 200-201）

市內及周邊名勝的旅行，或許才是京都博覽會真正的魅力。另一方面，我們應留意寺院作為展場產生的作用。威格曼提及了寺門到展場的坡道，且讚美庭院的精緻。此外，插圖上除展品與觀展者，也描繪了建築物木頭樑柱等結構特色。雖然寺院本身並非明確標示為「展示品」，但當西方人因展覽會之機會踏入寺院時，便因實際經歷而留下了具體的印象。作者提到進入知恩院境內有「陡坡」、「緩坡」兩條路徑，顯示除博覽會展品之外，對於古寺的環境本身也有所觀察。

選擇以寺院作為博覽會之場地，反映了寺院在現代之前，本就有做為某種程度的公共空間之意義。鈴木廣之曾在研究中，探討現代之前的廟會（在日本通稱為「開帳」），與現代之展覽會，意義明顯不同（鈴木廣之 81-91）。相對於鈴木先生強調新舊時代展覽會之差異，Peter Francis Kornicki 則認為幕末至明治時期的展覽會，多有新舊混融的現象（Kornicki 167-196）。筆者則擬指出，以寺院作為展場，「場域」本身就可能產生積極的效果。對西方人士來說，因參觀博覽會而踏入寺院場域，因此得見古寺範圍內，具有悠久歷史的建築、庭院，與附屬裝飾。可以想見，對於西方人來說，這些古老寺院本身的建築、內部裝飾的吸引力，恐怕不亞於展出的物件。即使在當時未必有很深刻的學術性認知，但這類在西方不容易看到的古寺場景，頗有可能增加他們認識東亞文化的意願。學者研究指出，京都於 19、20 世紀之交的英文遊記中，常被稱為神社佛閣之都（長谷川雅世 191-202）。另有研究指出，1870 年代初期至後期，短短十年之內，西方人書寫的旅行紀錄中，對於京都寺院之認知深度顯著提升（巫佩蓉 2023，59-102）。本研究可以補充，由於京都當地寺院有明確的作為，積極地歡迎外國觀者，因而增進了西方旅者認識古寺的機會。

除了作為展覽會場之外，佛寺也提供外國旅人住宿，這使外國人感受古寺環境的場域更加廣泛。《京都博覽會沿革誌》資料顯示，在博覽會期間，一般的外國人可住在圓山、下河原地區的十九間旅館；但地位較高的外國人，則可選擇住宿知恩院內的五處場所。位於市町的大雲院，並設有外國人的「應接所」，除了介紹博覽會之外，也協助安排旅宿（京都博覽協會 上卷，20-25；京都ホテル 145）。

有一則來自美國的旅行者朗費羅（Charles Appleton Longfellow, 1844-1893）的資料，提供了第一手的體驗感受。朗費羅在寫給妹妹的信中，以相當多的篇幅描寫知恩院的住宿。他指出有“Chion-in Hotel”大看板，居住的房舍本來是僧侶的居所，建築物相當美麗，還有庭園。居於此的外國旅客還可到一個大房間內一起吃飯，是由大阪經營西洋式旅館的商人籌辦的，擺設和餐飲都讓觀光客相當自在，氣氛有如在美國湖邊的度假地（Longfellow 166-171）。<sup>22</sup>除了信件之外，由朗費羅收藏的照片中，我們還可看到當時知恩院巨大壯麗的樓門（圖2）以及旅宿的樣貌（圖3）。<sup>23</sup>日式的房舍旁有池塘，環境十分優美舒適。對今日讀者而言，看到朗費羅稱知恩院有如美國湖邊度假地，似乎顯得不夠尊重。或可推想，寺院在考慮開放給外國人住宿之時，未必對於外來者是否尊重自身文化一事沒有疑慮。由此，我們更能設想明治初期寺院承受困境之深，並對寺院為了爭取新參與者的積極作為感到佩服。

---

<sup>22</sup> 筆者在此僅擬中立地呈現此資料，對於朗費羅稱此地如度假地，是否不當，暫不予討論。

<sup>23</sup> 朗費羅的文字和照片，當時並未出版，相關資料於20世紀後期方整理發表（山田久美子 3-15）。



圖 2：明治初期的知恩院三門（Longfellow 168 上）



圖 3：京都博覽會時期的知恩院旅宿（Longfellow 168 下）

除了博覽會的資料，明治初年，西方人的遊記中，也記錄了一些京都寺院提供外國人住宿之事。前述奧地利前外交官胡伯納，1871年9月的京都旅行，便有一段提到，京都地區寺院由於經濟困難，而將寺院中部分建物改為賓客住宿之所（Hübner 363）。雖然此遊記中並未特別提及外國旅客也可以投宿於寺院，但由知恩院的例子可知確實有寺院接納外國宿者。英國女性旅行作家布萊西（Annie Brassey, 1839-1887）1878年出版的旅行記中，則指出歐洲人對知恩院特別感興趣，因為1868年首次覲見天皇的外國使節便是住宿於此（Brassey 341）。由提供住宿給官方活動之外國人員，擴及影響面更廣的博覽會參觀者，顯示知恩院態度愈趨開放。

除了知恩院之外，亦有其他寺院提供外國人旅宿之例。1879年初，隸屬於英國海軍的建築師瑞德（Edward James Reed, 1830-1906）受日本政府之邀訪日，於日本境內旅行了大約三個月，在京都期間被安排住在建仁寺內。他的著作中對於房間內的擺設描述得非常仔細。房內既有歐洲式的桌椅、床和家具，也有京都當地所做的毯子、絲織品的桌巾、琺瑯雪茄盒、瓷製用品。擺設方面，除了屏風、掛軸，還有銅器、瓷器和漆器。瑞德還指出，這些擺設每日更換，增加了房間的吸引力；房間之外還有美麗的庭園，晴天時特別讓人感到愉快（Reed 180）。

可以合理推測，無論是京都博覽會期間，或是其他場合，1870年前後，京都便有些寺院習於提供西方人士住宿。雖然各個寺院擺設可能不同，但如瑞德指出，某些例子顯示室內環境與家具，甚至調整成西方人慣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即使有些配合西方訪者之處，寺院的建物與庭園，仍然使旅行者感受東亞傳統的優美。雖然未必每位參訪的西方

人士都對寺院文物有嚴肅的興趣，但寺院以開放心態接受西方訪者，增加了古代文物被新的參訪者觀覽、了解的機會。寺院整體環境的傳統特質，更讓參訪者留下美好的印象。

#### 四、1871 年與 1872 年京都博覽會場的具體範圍及構內文物

本節將整理 1871 年與 1872 年京都博覽會會場的具體範圍。由資料可知，1871 年的會場為西本願寺書院，明確列出的話，包括對面所和白書院。1872 年會場則加上建仁寺方丈、知恩院大方丈、小方丈。如上節所述，雖然這些場地並非「展示品」，但卻自然而然地提供博覽會觀眾具體體驗的機會。由這些建築物的尺寸，我們可以掌握到博覽會的規模。而建築物的歷史淵源，也是展品之外的看點。除了展場建築之外，參觀者踏入寺域時，也很可能看到這些寺院中的其他建築物。在以下討論中，除寺院歷史之外，將特別關注西本願寺、建仁寺、知恩院 19 世紀後期存有的建築與文物。筆者將注明是否現屬日本政府指定的「國寶」或「重要文化財」。雖然 1870 年代尚未有國寶指定制度，但這些後來被官方認定的作品，確實特別精美，並具有較重要的歷史意義。即使尚未有官方的文化財標識，參訪者也可能受到作品外觀形式特色，或是其歷史淵源吸引。

另外，筆者也將整理會場建築物中的室內障壁畫。這部分需要先說明：由於目前所得之資料有限，並不清楚博覽會觀者是否可以看到所有的障壁畫作品。當時展件的陳列方式，或也可能遮蔽了部分畫作。以筆者近年參觀寺院「特別公開」的經驗而言，即使於院內陳設展覽，寺院中的障壁畫仍然可見。但 1870 年代的陳列狀況如何，尚無具體資料。即使狀況不十分明朗之下，筆者認為仍須於此文討論的原因

是，早在 1960 年代，著名美術史研究者土居次義已指出，明治 4 年（1871）的博覽會，發行的目錄最後，介紹了西本願寺中障壁畫和天井繪之作者。<sup>24</sup> 近年其他學者亦重新提及此事（和田秀壽 11-42）。因此，筆者認為障壁畫確實於博覽會中可見，至少部分可見，且主事者也認為作為展場的寺院本身，尤其是寺中的障壁畫，是值得觀看的。

就歷史淵源而言，西本願寺、建仁寺、知恩院，分屬於淨土真宗、禪宗、淨土宗，且創立時期不同。然就實存建築物而言，於桃山時代至江戶初期都有新建或重建的堂宇；且因分別受到豐臣秀吉（1537-1598）或德川家諸位將軍的贊助，而具有極高的水準。無論是建築本身或裝飾於內部的障壁畫，皆出自名手，足以作為 16 至 17 世紀的代表作。特別是西本願寺與知恩院，前者有多座桃山時代的經典建築，後者則是德川家大力支持的寺院，規模與精美程度傲視群倫。

1871 年、1872 年博覽會皆設有會場的西本願寺，為淨土真宗之本山。淨土真宗奉親鸞上人（1173-1263）為祖，寺院早年於各地遷徙，天正 19 年（1591）依豐臣秀吉之令移轉至七条堀川之地後，成為京都規模最大的寺院之一，江戶時代也持續發展。<sup>25</sup> 京都之西本願寺，除了奉祀親鸞上人的御影堂（重要文化財）、奉祀主佛的阿彌陀佛堂（重要文化財）之外，亦以書院（國寶）、飛雲閣（國寶）、唐門（國寶）聞名。於寺院境內，很容易可見飛雲閣和唐門的外觀。飛雲閣，傳聞由豐臣秀吉的聚樂第移來，是一外觀奇特

---

<sup>24</sup> 土居次義 1968，113-131；此資料見於 118。亦請參考：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 43-44。

<sup>25</sup> 西本願寺綜合介紹，可參見：大谷光真、五木寬之，《新版古寺巡礼 京都 第 20 卷 西本願寺》。

的高層建築，為桃山時代著名的樓閣。<sup>26</sup> 唐門建於寬永年間（1624-1644），是今日建築學者認可的桃山時代代表作，華麗程度令人目眩。<sup>27</sup> 這些都是參觀者不難見到的建築物。

作為展覽會場的西本願寺書院，又細分為對面所、白書院、黑書院。<sup>28</sup> 「書院」一名，乍聽之下似乎並不特別，然而西本願寺書院空間之大，實令人驚異。對面所是極為有名的廣大室內空間，分為上段與下段，上段之間有四十一疊，下段之間有一百六十二疊榻榻米之大（圖4）。寬永11年（1634）德川家光（1604-1651）至京都時，曾於此處面會京都附近的官員與武士。1870年代作為博覽會會場，轉化為人人皆可購票進入的場域。對面所和白書院在空間上直接相連，另以一走道連接黑書院。白書院以三個房間為主體（一之間、二之間、三之間），附屬房間包括菊之間、雁之間、雀之間、裝束之間，另有兩個「武者隱之間」。位於對面所和白書院最外圍的，另有共四個「狹屋之間」。黑書院規模較小，屬於少數人見面的空間，這部分並沒有作為展示會場。<sup>29</sup> 整體來說，西本願寺書院不但面積頗大，且內部構造頗為複雜，對於參觀者而言，可能留下深刻印象。

參觀京都博覽會的一般群眾，於西本願寺書院可能見到的障壁畫，不但數量龐大且樣式多元。觀者進入昔日德川將軍面見地方大名之「對面所」，此處障壁畫，包括《商山四

---

26 飛雲閣圖版，請參見：宮次男 圖4、18，並請參見：平井聖 1982a，127。更詳細的解說見：近藤豐 89-96。由西本願寺官網亦可見圖版。

27 西本願寺唐門圖版，請參見：宮次男 圖1；並請參見：平井聖 1982b，124。圖版亦可參見：大谷光真、五木寬之 34。

28 西本願寺對面所、白書院、黑書院於寺院中的位置，以及室內配置圖，請參見：宮次男 124、125、128。

29 和田秀壽 11-42，特別是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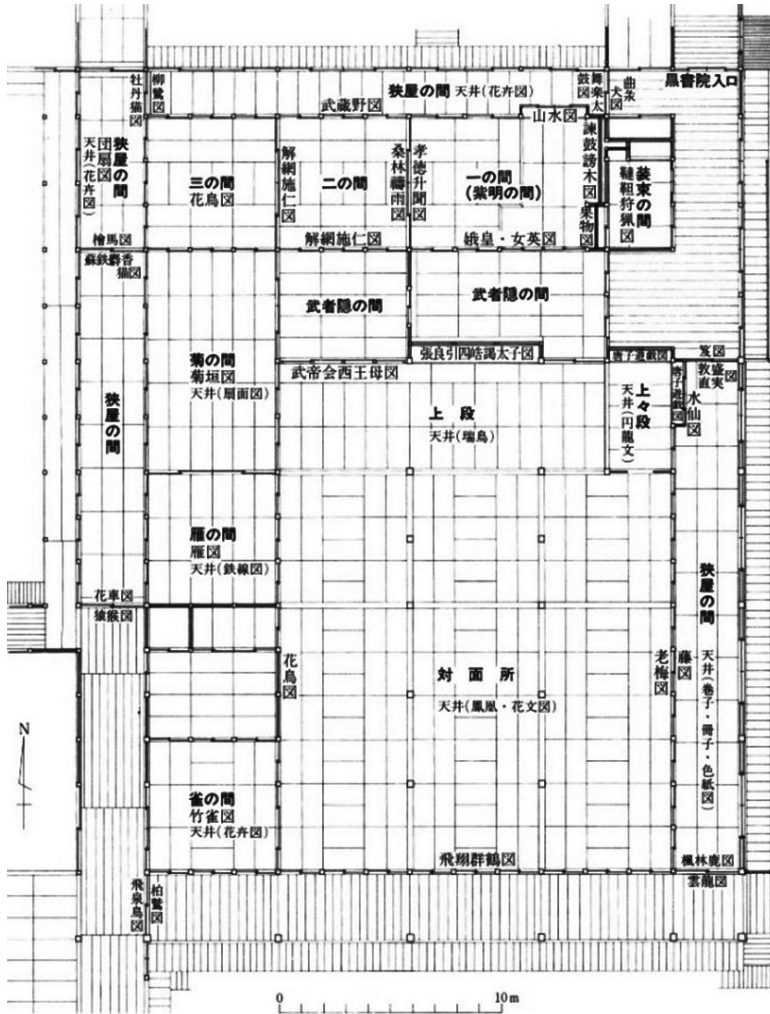


圖 4：西本願寺對面所與白書院內部平面圖（宮次男 125）

皓》、《武帝會西王母》、《老梅圖》、《花鳥圖》，華麗絢爛。白書院，則可依雀之間、雁之間、菊之間的順序前進，見入三之間後看到《花鳥圖》，並於二之間、一之間，

看到多組與《帝鑑圖說》有關的中國主題人物畫，以及《山水圖》。這些為數頗多的障壁畫，出於多位畫家之手，風格不同。即使不是專家，只要是對繪畫稍感興趣的人，不難感受到西本願寺書院障壁畫的多樣性。由題材來看，便有花鳥、人物、山水等完全不同主題的作品；整體看來有如桃山、江戶初期繪畫的大百科。此外，有興趣的參觀者也能由博覽會的目錄中，得到基本的畫作資料。雖然這些百年前的資料，相對於今日學界細膩研究下，對於障壁畫作者的考訂，未必無誤，然而，寺院空間及所屬障壁畫，轉為博覽會場並被編寫入目錄一事的文化脈絡轉變，仍值得關注。<sup>30</sup>

博覽會參觀者於 1872 年另一會場，建仁寺展場，同樣有機會可見 16 至 17 世紀的建築與障壁畫。建仁寺，由日本僧侶明庵榮西（1141-1215）於建仁 2 年（1202）開山，本為真言、止觀、禪兼修的寺院。13 世紀中期，由圓爾弁圓（1202-1280）、蘭溪道隆（1213-1278）先後擔任住持之後，轉為禪寺。室町時代，名列京都五山第三位。<sup>31</sup> 不過，歷經火災，尤其是 1467 至 1469 年間的應仁之亂，創建當時的堂宇已灰飛煙滅（下坂守 11-16）。19 世紀時可見，且迄今現存的建物多為 16 世紀之後所建。作為會場而建仁寺方丈，乃 16 世紀末由著名僧侶瑤甫惠瓊（1539-1600，又稱安國寺惠瓊）由他處移築，但內部障壁畫則為海北友松（1533-1615）新作。惠瓊本出身於武士家族，為僧之後仍遊走於戰國時代的諸大名之間，擔任外交工作，並得到豐臣

---

<sup>30</sup> 西本願寺書院障壁畫，出自多位畫家，考訂詳見：土居次義 1968，113-131。

<sup>31</sup> 京都五山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而南禪寺則被稱為五山之上。

秀吉的重用。

方丈，本指寺院住持居所，但在日本，也作為接待檀那（贊助人）之處。建仁寺方丈，現屬重要文化財，於京都的禪宗方丈中，古老程度僅次於東福寺龍吟庵（石川登志雄 129-136）。相對於時代較早的方丈建築，江戶時期新建或改建的方丈，面積愈發宏大。再度可證，京都博覽會的展場實有相當的規模。建仁寺方丈，最大的房間（稱為「室中」），為四十四疊，即，有四十四個榻榻米之大。除室中之外，尚有裏之間、上間一之間、上間二之間、下間一之間、下間二之間（圖 5）。<sup>32</sup> 此處之障壁畫作品，共有五十面，簡述如下：室中為《竹林七賢圖》（十六幅），上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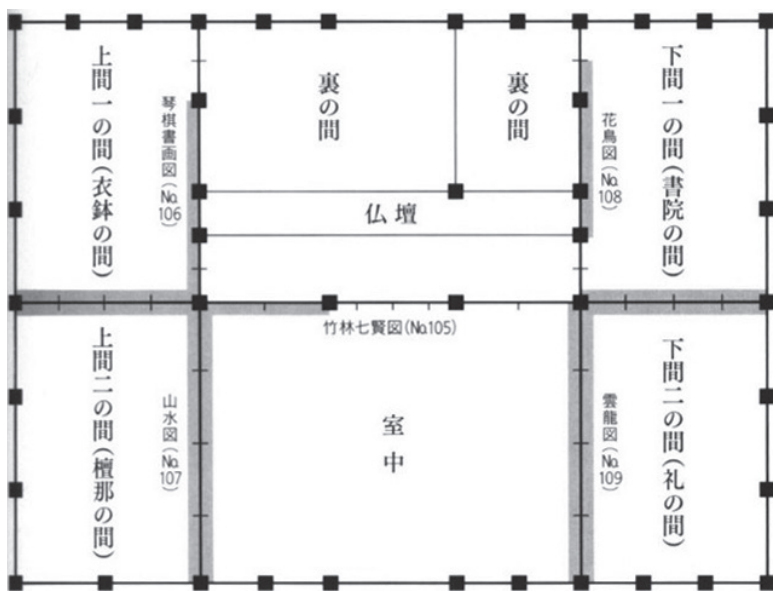


圖 5：建仁寺方丈平面圖（東京國立博物館 296）

<sup>32</sup> 建仁寺方丈平面圖及障壁畫分布，可見：東京國立博物館 296、圖

之間（又稱「衣鉢之間」）為《琴棋書畫圖》（十幅），上間二之間（又稱「檀那之間」）為《山水圖》（八幅），下間一之間（又稱「書院之間」）為《花鳥圖》（八幅），下間二之間（又稱「禮之間」）為《雲龍圖》（八幅）。<sup>33</sup> 這些作品為水墨淡彩，皆出自海北友松（1533-1615）之手，現皆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友松是桃山時代代表畫家之一，風格與前述西本願寺障壁畫作者之狩野派有別。<sup>34</sup> 即使是對東亞繪畫不熟悉的人，有機會看到數量龐大且主題不同的水墨障壁畫，必然是特別的體驗。而其中若有稍對繪畫感興趣者，也不難初步領略畫家的非凡畫技（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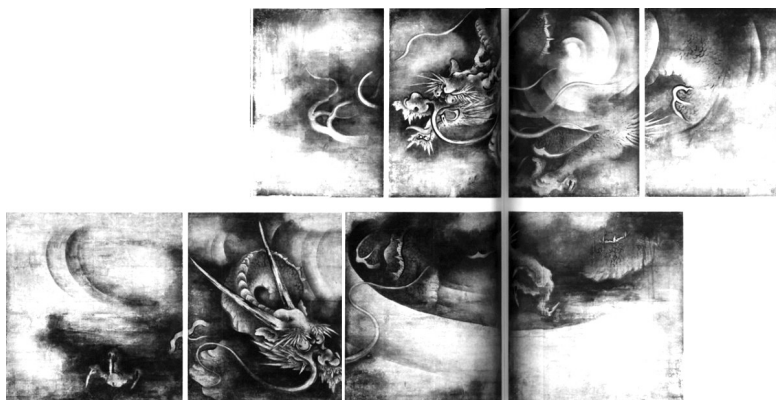


圖6：海北友松，《雲龍圖》（建仁寺方丈障壁畫局部）。（東京國立博物館 170-172 上，圖 109）

105-109。亦可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 圖 161-165；小堀泰巖、竹西寬子 56-69。

<sup>33</sup> 海北友松：《雲龍圖》，紙本墨畫，其中四幅，各縱 186.0 公分，橫 133.0 公分；另四幅，各縱 198.0 公分，橫 187.0 公分。參見：田沢裕賀 296-298。

<sup>34</sup> 有關海北友松的近年研究，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每日新聞社，《海北友松：京都國立博物館開館 120 周年記念特別展覽會》。

1872年博覽會另一會場知恩院，正式名稱為華頂山知恩教院大谷寺，是淨土宗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寺史雖遠溯法然上人（1133-1212）於此地傳教，但真正確立今日之規模，乃自17世紀初，得到德川家之贊助開始。隨著德川家的權力鞏固，家康（1543-1616）、秀忠（1579-1632）、家光（1604-1651），三代將軍皆大力支持知恩院新建堂宇。建於江戶初期的三門（即寺院大門，國寶）、方丈（重要文化財）等，巨大華麗，傲視京都其他寺院。此外，德川家並賜與知恩院年俸，維繫寺院的經營（菊池勇次郎 90-94；平井聖 1982c，95-102）。知恩院在江戶時代極為繁盛，18世紀後期出版的《都名所圖繪》中，稱此為「洛東第一大廈」。<sup>35</sup>前文指出，當時參觀博覽會的外國人朗費羅收藏的照片中，包括知恩院的三門。

作為京都博覽會會場的知恩院大、小方丈，建於1641年，空間廣大，並以17世紀初期狩野派障壁畫著稱（土居次義 1969，96-135）。知恩院大方丈，有上段之間、中段之間、下段之間、佛之間、裏上段之間、菊之間、鶴之間、鷺之間、松之間、柳之間、梅之間（圖7）。小方丈則有上段之間、下段之間、羅漢之間、雪中山水之間、花鳥之間、蘭亭之間。<sup>36</sup>大小方丈中規格較高的房間（上段、中段、下段之間），繪製了山水畫，其他房間則有人物、花鳥畫。部分房間的名稱，也明示了畫作的主題。障壁畫的主要畫家為狩野探幽之弟，狩野尚信（1607-1650）。河野元昭的論

---

<sup>35</sup> 河野元昭文提及，見：河野元昭 113-122。筆者確認過史料，見：秋里籬島 275。原書為1780年出版。

<sup>36</sup> 知恩院大小方丈障壁畫局部圖，見：宮次男 圖 33-38；配置圖見 11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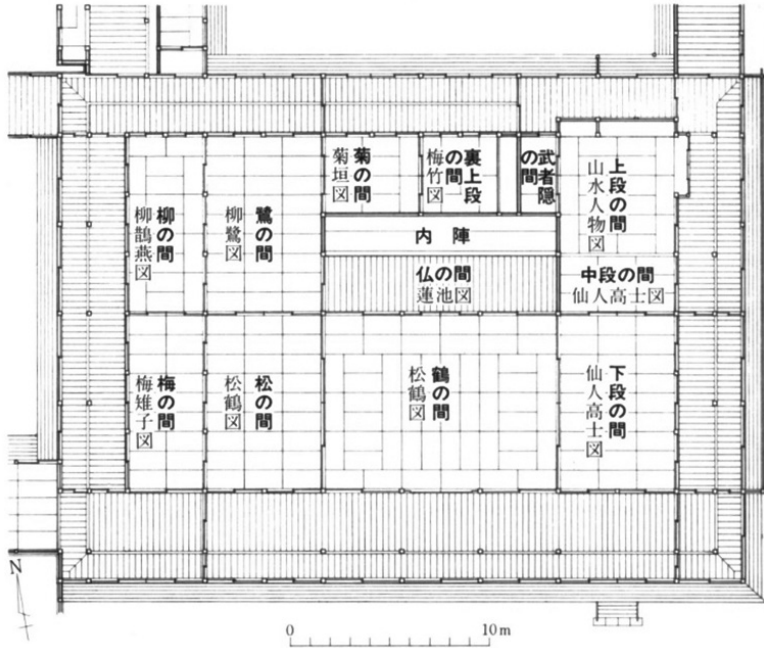


圖 7：知恩寺大方丈平面圖（宮次男 113）

文指出，知恩院大、小方丈的障壁畫，除了個別畫作精彩之外，更重要的在於主題、畫法的豐富，與整體配置的考慮（河野元昭 113-122）。細膩的配置設想，雖然未必受 1870 年代所有參觀者充分理解，但觀者至少可領略到畫作的多樣性。

以上詳細地討論了西本願寺、建仁寺、知恩寺等，作為京都博覽會場的具體範圍，有幾個意義。首先，一般來說，如由字面上得知博覽會於寺院中的「書院」、「方丈」等建築物舉行，並不容易理解展覽的規模。而本節指出，這些寺院的書院或方丈建築規模之宏大，實不容小覷。特別是西本願寺的書院，上段與下段之間，合計超過兩百疊榻榻米，

可見能容納大量的展覽品。其次，考察歷史淵源，得知作為展場的三所寺院，皆為桃山到江戶時代首屈一指的名寺，寺內建物得到當時最高位武士的大力支持。這些建築物，屬於16、17世紀的最高規格，本身便極有可觀性。可以推測，參觀者未必要得到明確的文字說明，才能知道這些建築物的不同凡響。即使未必能掌握正確的細節資訊，只要被允許進入這些空間之中，就有實際觀察具代表性建築與構內裝飾的機會。況且，與展覽會有關的目錄中，描述了西本願寺的障壁畫，顯示主辦方認為有介紹給觀者的必要。這表示除了建築本身可見之外，至少有部分建物附屬障壁畫也可見，且被提供基本說明。古代作品是否有機會被親眼看到，而非僅透過文字記載的資料來傳布，對美術品評價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議題。

雖然理想上，我們希望找到更直接的證據，證實京都博覽會當年便有西方人對於障壁畫印象特別深刻，但目前尚未尋得此類資料。不過，筆者仍大膽推測，由於博覽會活動的契機，對於促使寺方古物受更多在地文化圈之外人士關注，頗有助益。文化的影響力往往需要一些時間發酵，古寺相關文化域外傳播之廣度與深度，值得由一些後續的現象再觀察。1870年代的出版品，證明有多位西方旅人對京都寺院之多，歎為觀止（巫佩蓉 2023，59-102）。在此可再補充一份資料，美國化學家克拉克（Edward Warren Clark, 1849-1907），雖然並不是一位外交人員，也非歷史學者或工藝美術專家，仍於1878年出版的 *Life and Adventure in Japan* 一書中，提到容許參觀的京都寺院極多（Clark 202-205）。克拉克於1871至1875年間於日本擔任化學教師，先後居於靜岡和東京，曾於夏季至京都旅行。他以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著稱，回國之後轉為教會服務。這本記錄日本生活與旅行的

書籍，乃由專門出版基督教書籍的著名機構 American Tract Society 發行。由此例可見，即使對信仰完全不同的西方人士而言，京都佛寺仍值得一記。這類非由專家書寫的遊記，雖然內容簡潔，並無深入評價，反而可以證實京都古寺受到廣泛的關注。至於深度方面，於明治時代晚期，即 19、20 世紀之交，西方旅行者所寫的英文遊記中，便有多例提到西本願寺的壁畫和襖繪。某些遊記不僅表示對障壁畫的興趣，甚至點出是狩野派的傑作，可見認知程度深化（長谷川雅世 191-202）。換言之，舉辦於 1872 年的第一回正式京都博覽會，雖然未必於當年就產生直接效應，使西方人士立即視京都佛寺建築與構內障壁畫為藝術傑作，但寺院的開放態度、博覽會相關的措施，使得異文化圈的接觸成為可能。並且，這樣的接觸，並非局限於少數位居高位者的特殊待遇，而是博覽會八十日會期之內即有七百位以上的外國人士參與。由初步接觸到於異國文化圈中確立名聲，需要時間的累積。本文主要呈現明治初期，距離維新之時代巨變僅有幾年的時間，京都有數所極為重要的古寺，便已開放範圍頗大的寺院領域，供傳統贊助人之外的觀者購票觀覽。這些領域內，有優美的景觀、深具傳統特色的建築，更有今日被認定為重要文化財的繪畫作品。這樣供一般人員觀覽的開放機會，連外國人也被鼓勵參與，奠定了往後京都古寺獲得在地文化圈之外人士認可的基礎。

## 五、結語

本文探索了明治時代最初期，即 1871、1872 年，京都地區舉行的新式博覽會，以及當地佛教寺院積極參與博覽會的實際狀況。此時間點之早，最為關鍵。明治時代，見證了日本由傳統轉變為現代社會之歷程。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

初期，日本雖多採用西方政經制度、接納西方文化價值，但也較成功地保存了固有的歷史文化。明治政府的諸多作為，如明治 15 年（1882）上野博物館的開館（作為明治 22 年帝國博物館之前身）、明治 30 年（1897）古社寺保存法的成立等，皆被視為古代文物、文化得以妥善保存的重大舉措（関秀夫 239-241）。而 1901 年由日本官方編纂的《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發行，則被視為有效地將古代文物納入西方學術脈絡的重大出版。<sup>37</sup> 有關傳統文物於現代社會中定位轉型的議題，以上具里程碑性質的館舍建置、法令公告、出版活動等，已有諸多學者討論。然而，本研究的出發點，在於觀察明確價值成形之前的先驅。換言之，博物館的成立、法令的制定、美術史編寫完成，實代表新觀念的成熟發展。而在這些里程碑成立之前，社會上有些性質多元且內容混雜的活動，表面上看來並非純粹地推動某種單一新價值（如寺院古物轉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但對於新觀念的推進，卻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東西交流的議題，素為學界關注。然而，研究者向來對 19 世紀興起的博覽會，多半偏向考察其對東亞社會的新影響。本研究則指出，標舉為推廣新知的西式活動，因實際舉辦的內容特性，反而成為發揚古物文化價值的場域之一。本文討論了京都佛寺參與博覽會的具體形式，寺院除了提供展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同意以寺中場域作為展覽場地，甚至供外國人住宿，因而使來自在地脈絡之外的新群眾，獲得觀覽傳統寺院的機會。天皇移居東京，以及新政府對於佛教的壓抑，造成經濟衰落與文化地位崩潰的雙重危機，是促使京都

---

<sup>37</sup> 原書無編者名，但有明治 32 年（1899）帝國博物館總長男爵九鬼隆一（1852-1931）序。

地區佛寺必須轉變的重要原因。佛寺之因應，除了參與博覽會，也積極地接納外國觀者。以佛寺傳統來說，讓寺院外的人士觀覽，並非完全無跡可循。無論是西本願寺的書院，或是建仁寺、知恩院的方丈，江戶時期就是寺院與贊助人會面的空間。就功能而言，由提供私人人際關係的交流場域，轉變為舉辦公開展覽的場所，本質上有亦有相通之處。

本文之目的，並非探究博覽會的參觀者中，是否有人對於與寺院所屬的古代文物詳細閱覽，甚至作了嚴肅的研究，而是要強調，於明治時代最初期，京都地區古寺便已參與了規模宏大的新式展覽會，使得寺院古物得以被大量觀眾觀看，開展了新的意義脈絡。原本屬於同文化圈人士崇拜或欣賞的古老物件，並非擺到博物館或美術館中，才開始進入現代觀覽的場域。雖然博覽會之類的新式展示活動，有多元目的，並非以推動佛教文化，或美術鑑賞為主軸，但實際上成為佛寺文物意義轉型之契機。而就東西交流的面向而言，西方人於京都博覽會中接觸到的古物範圍，比起在國外的博覽會或商店中，更為豐富多元，很可能激發起對寺院文化更深更廣的興趣。這樣的興趣在 19、20 世紀之交持續發展，於西方人的旅行書寫或導覽手冊中明確可見（巫佩蓉 2020，1-42）。直至今日，參觀京都古寺，已非日本當地信徒、文化愛好者或專家的專利，而是全世界旅人共同嚮往的旅行標的。

## 引用文獻

### 一、經典文獻或古籍

《京都博覽會沿革誌》（共3卷），京都博覽協會編，京都：京都博覽協會，1903年。

《都名所圖會》，秋里籬島，《新修京都叢書》（第6冊），新修京都叢書刊行會編，京都：臨川書店，2002年，原書為1870年出版。

《稿本日本帝國美術略史》，小路田泰直監修，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年，復刻日本農商務省1901年刊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Brassey, Annie. *A Voyage in the 'Sunbeam'. Our Home on the Ocean for Eleven Month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78.

Clark, Edward Warren. *Life and Adventure in Japan*.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878.

Hübner, Joseph Alexander.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1871*. Paris: Hachette, 1873.

———.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1871*, trans. Mary Elizabeth Herbert,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9.

Reed, Edward James. *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 vol. 2. London: J. Murray, 1880.

Wirgman, Charles. "The Japanese Exhibitio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 October 1872, in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ed. Terry Bennett,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Ltd, 2006, pp. 200-201.

Yamamoto, Kakuma. *The Guide to the Celebrated Places in Kiyoto & the Surrounding Places for the Foreign Visitors*. Kyoto: Niwa, 1873.

## 二、研究文獻

- 下坂守：〈建仁寺の歴史〉，《建仁寺：京都最古の禪寺》，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大阪：讀賣新聞社大阪本社，2002年，頁11-16。
- 丸山宏：〈近代ツーリズムの黎明：「内地旅行」をめくって〉，《十九世紀日本の情報と社会変動》，吉田光邦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頁89-112。
- ：〈明治初期の京都博覧會〉，《万国博覧會の研究》，吉田光邦編，京都：思文閣，1986年，頁221-248。
- 丸山宏等編：《近代京都研究》，京都：思文閣，2008年。
- 土居次義：〈西本願寺障壁畫とその筆者〉，《障壁畫全集 6 西本願寺》，土居次義編，東京：美術出版社，1968年，頁113-131。
- ：〈知恩院の障壁畫〉，《障壁畫全集 7 知恩院》，土居次義編，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年，頁96-135。
- 土居次義編：《障壁畫全集 6 西本願寺》，東京：美術出版社，1968年。
- ：《障壁畫全集 7 知恩院》，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年。
- 大谷光真、五木寛之：《新版古寺巡礼 京都 第20卷 西本願寺》，京都：淡交社，2008年。
- 小堀泰巖、竹西寛子，《建仁寺：京都最古の禪寺》，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大阪：讀賣新聞社大阪本社，2002年，圖161-165。
- ：《新版古寺巡礼 京都 第23卷 建仁寺》，京都：淡交社，2008年。
- 山本真紗子：〈明治京都における官製「美術」概念の受容—京都の博覧會と美術商・「美術館」をめぐる—〉，《コア・エシックス》，卷5，2009年，頁393-402。
- 山田久美子：〈まえがき〉，《ロングフェロー—日本滞在記：明治初年アメリカ青年の見たニッポン》，Charles Appleton Longfellow 著，山田久美子譯，東京：平凡社，2004年，

頁 3-15。

- 工藤泰子：〈明治初期京都の博覧会と観光〉，《京都光華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 46 期，2008 年，頁 77-100。
- 北澤憲昭：《境界の美術史：「美術」形成史ノート》，東京：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2001 年。
- 北澤憲昭等編：《美術の日本近現代史：制度、言説、造型》，東京：東京美術，2014 年。
- 平井聖：〈飛雲閣圖版解説〉，《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宮次男編，東京：集英社，1982a 年，頁 127。
- ：〈唐門圖版解説〉，《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宮次男編，東京：集英社，1982b 年，頁 124。
- ：〈浄土寺院の建築〉，《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宮次男編，東京：集英社，1982c 年，頁 95-102。
- 石川登志雄：〈建仁寺の文化財〉，《新版古寺巡礼 京都 第 23 卷 建仁寺》，小堀泰巖、竹西寛子著，京都：淡交社，2008 年，頁 129-136。
- 田中彰，《明治維新と西洋文明：岩倉使節団は何を見たか》，東京：岩波書店，2003 年。
- 田沢裕賀，〈雲龍圖 圖版説明〉，《栄西と建仁寺特別展》，東京国立博物館編，東京：讀賣新聞社，2014 年，頁 296-298。
- 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 年。
- 佐佐木克：《江戸が東京になった日：明治二年の東京遷都》，東京：講談社，2001 年。
- 佐藤道信：《「日本美術」誕生：近代日本の「ことば」と戦略》，東京：講談社，1996 年。
- ：《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年。
- 巫佩蓉：〈1880 年代英文旅行手冊中的京都古寺：佛教美術史書出現之前的古寺遊賞〉，《藝術學研究》，第 27 期，2020 年，頁 1-42。

- ：〈1870年代西方人筆下の京都古寺〉，《成大歷史學報》，第64號，2023年，頁59-102。
- 並木誠士：〈京都の初期博覧会における「古美術」〉，《近代京都研究》，丸山宏等編，京都：思文閣，2008年，頁318-337。
- ：〈はじめに〉，《近代京都の美術工芸：制作、流通、鑑賞》，並木誠士編，京都：思文閣，2019年，頁iv-xv。
- 並木誠士等編：《京都伝統工芸の近代》，京都：思文閣，2012年。
- 京都ホテル：《京都ホテル100年ものがたり》，京都：京都ホテル，1988年。
- 京都国立博物館編：《建仁寺：京都最古の禪寺》，大阪：讀賣新聞社大阪本社，2002年。
- 京都国立博物館、毎日新聞社編：《海北友松：京都国立博物館開館120周年記念特別展覧会》，京都：毎日新聞社，2017年。
- 和田秀寿：〈初期京都博覧会〉，《博覧——近代京都の集め見せる力》，龍谷ミュージアム編，京都：龍谷ミュージアム、京都新聞，2022年，頁11-42。
-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明治期府県博覧会出品目録：明治四年—九年》，東京：中央公論美術，2004年。
- 東京国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1973年。
- ：《栄西と建仁寺特別展》，東京：讀賣新聞社，2014年。
- 河野元昭：〈知恩院障壁画について〉，《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宮次男編，東京：集英社，1982年，頁113-122。
- 近藤豊：〈西本願寺の建築〉，《障壁画全集 6 西本願寺》，土居次義編，東京：美術出版社，1968年，頁89-96。
- 金子錦二，〈緒言〉，《京都博覧會沿革誌》（上卷），京都博覧協會編，京都：京都博覧協會，1903年，緒言頁4。
- 長谷川雅世：〈明治時代の京都でのイギリス人旅行者の神社仏閣めぐり—イギリス人の旅行記に描かれた京都の特別な

- 寺々〉，《高知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第 75 號，2015 年，頁 191-202。
- 宮次男編：《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東京：集英社，1982 年。
- 脇田修、脇田晴子：《物語京都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年。
- 高田良信、堀田謹吾：《追跡！法隆寺の秘宝》，東京：徳間書店，1990 年。
- 國雄行：《博覧会の時代：明治政府の博覧会政策》，東京：岩田書院，2005 年。
- ：《博覧会と明治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年。
- 菊池勇次郎：〈法城：知恩院と東西本願寺の成立〉，《日本古寺美術全集 21 本願寺と知恩院》，宮次男編，東京：集英社，1982 年，頁 90-94。
- 鈴木廣之：《好古家たちの 19 世紀：幕末明治における「物」のアルケオロジー》，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年。
- 関秀夫：《博物館の誕生》，東京：岩波書店，2005 年。
- 龍谷ミュージアム編：《博覧——近代京都の集め見せる力》，京都：龍谷ミュージアム、京都新聞，2022 年。
- 西本願寺：<https://www.hongwanji.kyoto/see/>，2025.2.10。
- Bennett, Terry, ed.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Ltd, 2006.
- Longfellow, Charles Appleton 著，山田久美子譯：《ロングフェロー日本滞在記：明治初年アメリカ青年の見たニッポン》，東京：平凡社，2004 年。
- Kornicki, Peter F. “Public Display and Changing Values: Early Meiji Exhibitions and Their Precursors.”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49, no. 2, Summer 1994, pp. 167-196.

# The Participation of Ancient Temples in the Kyoto Exposition in the Early 1870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Temples and Their Artifact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Peijung Wu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junc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As early as 1871,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Meiji era, local residents of Kyoto held the first exposition of the Meiji period at Nishi Hongan-ji. Following the event, a permanent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Kyoto Exposition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which had a semi-official nature, and in 1872, it held its first official exhibition at venues including Nishi Hongan-ji, Chion-in, and Kennin-ji. Although the Kyoto Exposition promoted the goal of "exploring new knowledge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 it did not specifically aim to promote Buddhist culture. However, due to the substantial involvement of ancient temples providing exhibits and the use of temple grounds as venues in the early stages, the exposition became a platform for temple artifacts to be viewed by new audiences. In the context of shifting modes of viewing, even though the temple artifacts remained in their original spaces,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underwent a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The Kyoto temples and their artifacts, originally embedded in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of devotees and the aesthetic traditions of the local cultural sphere, found their positions within the knowledge systems drastically altered. These shifts included the inclusion of new audiences and change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xisting ones.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the organizers of the Kyoto Exposition intentionally sought to attract foreign viewers and devised various specific measures for this purpose. Obser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se new audiences from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reveals the trajectory of how the

meanings of temple artifacts evolved in the modern era.

This study does not limit itself to the official goals set by the Kyoto Exposition, but rather carefully examines the details of the actual events. These substantive conditions help to elucidate how such new activities, which did not primarily aim to promote "fine arts" or "Buddhist culture," facilitated the incorporation of ancient artifacts into modern knowledge systems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ized artifact compilation activities.

### Keywords

Kyoto Exposition, Nishi Hongan-ji, Kennin-ji, Chion-in,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